

共鑒五四

劉再復著

范曾題



共鉴“五四”

与李泽厚、李欧梵、林岗诸友人论衡五四新文学运动

刘再复 著

福建教育出版社·福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共鉴“五四”/刘再复著. —福州: 福建教育出版社,
2010. 1

(刘再复作品)

ISBN 978 - 7 - 5334 - 5268 - 1

I. 共… II. 刘… III. 五四运动 (1919) - 研究 IV.
K261. 1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8167 号

共鉴“五四”

刘再复 著

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

(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.fep.com.cn)

出版人 黄旭

发行热线 010 - 62027445

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编 276017)

开本 635mm × 965mm 1/16

印张 16

字数 156 千字

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月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 - 7 - 5334 - 5268 - 1

定价 2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读者服务部 (电话: 010 - 62027445) 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“五四”五说（代序）——李泽厚 刘再复

- 1 一 “五四”了不起
- 3 二 反孔也了不起
- 5 三 最缺的还是德赛两先生
- 6 四 告别“新启蒙”
- 8 五 五四新文化诸子评说
- 14 附录：一字之差的说明

五四新文化运动批评提纲

- 18 一 重心明确但理论准备不足
- 22 二 批孔的合理性与浪漫性
- 24 三 德赛两先生的体用分离
- 27 四 文学革命的概念错位
- 30 五 现代人文经典创造意识的阙如

35	六 主攻对象置换的假设
37	附录一：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
48	附录二：谁是最可怜的人？
54	附录三：伟大的内心律令——在香港北大校友会上的讲话
	“五四”启蒙问题答问纪要——答北京鲁迅博物馆姜异新博士问
60	一 关于启蒙的反思
64	二 现代启蒙有无独特的话语谱系
68	三 “五四”若干主将的不同思路
71	四 清华诸子也属新文化范畴
75	五 《红楼梦》是“五四”的先声
77	六 关于鲁迅的新认识
84	七 海外语境下的思索与研究
	病理学启蒙的反思——刘再复、李欧梵对话录
88	一 病理学启蒙与生理学启蒙
92	二 行动生活与沉思生活

- 95 三 独立存在与象牙之塔
- 97 四 抽象能力与形而上品格
- 100 五 “新启蒙”命题已过时

“五四”中心理念及其历史语境——近现代中国三大意识的觉醒

- 102 一 “民族—国家”意识的觉醒
- 109 二 “人—个体”意识的觉醒
- 118 三 阶级意识的觉醒与个体意识的灭亡

关于个人主义与新文学的思考——与李泽厚的两篇对话

- 123 一 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浮沉
- 134 二 中国现代诸作家评论

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

- 145 一 历史角色的互换——启蒙主体的易位
- 156 二 社会运动重心的转移和个性生长土壤的贫瘠
- 172 三 启蒙主题的回归与创作个性

“五四”与西方的文艺复兴

- 178 一 “五四”与西方文艺复兴的不同思路
- 184 二 民族“厄运”与个人“厄运”的重叠
- 189 三 三种“吃人”方式的发现
- 196 四 人伦网络与礼治秩序

“五四”语言实验及其流变史略

- 208 一 “五四”语言变革的伟大动机
- 215 二 新语言的困境和媚俗流向
- 229 三 走出俗化政治化的语言新试验

242 后 记

“五四”五说（代序）

李泽厚 刘再复

一 “五四”了不起

刘再复：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，香港三联约我一本书，我就把这两年发表的有关于“五四”的访谈、对话、文章汇为集子，也借此更加明快地表述一下自己对“五四”启蒙运动的思想。此集您如果能作篇序言就好了，可惜您已封笔，只好作罢。不过，今天我还是想再听听您对于“五四”有没有新的想法。在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和《告别革命》中，您已作过充分论述。十几年、二十几年过去了，语境变了，不知道您有无修正或补正。

李泽厚：我读了你最近发表在《书屋》的文章和访谈，写得很好。我对“五四”的看法没有改变。在诋毁“五四”、盛行尊孔成为时尚

的今天，我更顽固地坚持原有的看法。“五四”了不起。胡适、陈独秀、鲁迅之大功不可没。

刘：“五四”了不起。您的态度一直很鲜明。我虽然谈论“五四”的缺陷，但也充分肯定其历史功勋。白话试验，文字奉还，个性呼唤，发现传统资源不足以应付现代化的挑战 and 理性逻辑文化的阙如等，都是功不可没。

李：谈论中国近现代史，特别是近现代思想史，前不可能绕过康、梁、严，后不可能绕过陈、胡、鲁。他们是重要的文化历史存在。可以不讲陈寅恪、钱锺书，但不可不讲鲁迅、胡适。

刘：陈、鲁、胡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，其思想代表了一个时代并辐射了几代人。康梁那个时代讲的新国民，着眼点还是“群”，陈独秀、鲁迅、胡适却破除“国家偶像”，着眼点是“己”，突出的是个人。所以我说康梁时代是“民族—国家”意识的觉醒，“五四”则是“人一个体”意识的觉醒。之后还有“阶级”意识的觉醒。三者形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流。

李：“五四”时期各种思潮聚汇，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就很盛行。“五四”突出个人，张扬个性。可惜后来“个性”又被消灭了。“五四”的了不起，在于它的主题鲜明，击中要害，中国缺的正是个性和个体独立的精神与品格。

刘：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。在中国，支撑个人独立不移的品格真不容易。我喜欢用“个体灵魂主权”一词来表述。觉得康梁时代关注的重心是国家主权和相应的社会制度合理性问题，而“五四”关

注的重心则是个人灵魂的主权。反对奴性，反对国家偶像，反对族群偶像孔夫子，都是在呼唤灵魂的主权。

二 反孔也了不起

李：“五四”批判孔家店不同于“文革”的批孔，两者实质内容恰好相反。汉代“独尊儒术”以来，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都尊孔。其中的确有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方面。康有为的变法改制还必须打着孔子的旗号，可见走向现代化，行步维艰。直到“五四”才直接挑战孔子，结束两千年一贯的尊孔历史。“文革”时的批孔恰好是维护专制统治。第一幕是了不起的悲剧，第二幕是可笑的闹剧。

刘：第一幕中孔子虽然担荷中国文化负面的全部历史罪恶，但批判的毕竟不是孔子儒家的原典，而是被宋儒明儒和后人改造过的变形的孔夫子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“五四”的批孔，反而去蔽存真，扬弃了真孔子的覆盖层，使孔子的原典学说具备恢复本来面目的可能。您写《论语今读》，不就得益于“五四”的批判，直面没有被遮蔽、被改造的孔子吗？“文革”第二幕，我们亲自经历过，那确实是相反，狠批的是孔子原典和孔子本人，把孔子说成是“巧伪人”，把《论语》一段一段宰割，而把“五四”批掉的“忠”字举得高入云天，愈批愈走远，不仅离孔子原典愈远，也离“五四”的现代精神尤其是科学民主精神愈远。去年我应英国《金融时报》张力奋兄的邀请，写了《谁是最可怜的人》，认为孔子最可怜，因为他被随便揉捏，随便解释。其次

孔子的儒家原典具有很高的伦理价值、教育价值，甚至有很高的哲学价值。正如您在《论语今读》中所评价的那样，孔子把人的地位提得很高，确实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体系。但是孔子学说后来被改造成为帝王服务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“三从四德”等一套行为模式，就变得面目可憎了。“五四”攻击的实际上是变形变质了的孔夫子。您在《波斋新说》里首次把儒分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，对我很有启发，《红楼梦》作为异端之书，它反叛的是儒家的道统即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，但是对您所说的“情本体”这种深层内涵，却极为尊重，所以贾宝玉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是个“逆子”，但在伦理情感层面上却仍然是个“孝子”。

李：你的《谁是最可怜的人》，写得很生动。对孔子的尊敬，不是让孔子去媚俗。记得李大钊等当年也说过，他们批判的孔子，是宋明道学家塑造过的孔子。其实只有批判掉这个孔子，才能恢复原典儒家的孔子，只有批判“存天理灭人欲”、专重心性修养的孔子，才能恢复重视情感、重视物质生命、重视人民现实生活的孔子。“五四”反对的是在孔子名义下的君臣秩序、父子秩序、夫妻秩序以及所延长的妇女“节烈”观（连僻远的山区如张家界也可以看到贞节牌坊），如此等等，这一套确实非常不符合于现代社会的生存发展，是“五四”发出第一声强烈的抗议呐喊。

刘：鲁迅所憎恶的“二十四孝图”，什么郭巨埋儿、曹娥投江等等，每样行为语言，都是在孔子孝道名义下吃人、吃孩子、吃妇女。批判这种变态的孔夫子，也属天经地义，九十年过去，中国人再也不

必去充当悲惨可怜的孝子节妇了，这要感谢“五四”的先人先贤。可是，这几年，孔夫子恢复名义之后，又有一些知识人要把老师当父亲，行拜祭大礼，不知又要把孔子揉捏成什么样子？

三 最缺的还是德赛两先生

李：十多年前我写《论语今读》，返回孔子。现在尊孔成了时髦，我就不再谈了。因为讲孔子成了掩盖更重要更必需的东西的手段。中国现在最需要的还是“五四”推出来的两先生：德先生与赛先生。我高度评价孔子，但反对以尊孔的潮流来掩盖现代文明所要的科学民主。对于传统，林毓生讲“创造性转化”，我讲“转化性创造”。孔子是我们的重要资源，但不能代替我们的现代创造。

刘：“五四”的大思路是用西方的理念来批判中国传统，以实现传统的西化，但其致命的弱点是缺少自身的理论创造。您的命题实际上是要开掘传统资源，打通中西文化血脉，实现自己的建设性创造。重心是建构，不是解构。后现代主义思潮以解构西方形而上体系为目标，否定西方启蒙理性，这种主义形成了时尚。我觉得，科学与民主正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两大基本成果，“五四”把它“拿来”，是拿对了。20世纪的西方，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，但科学理性却朝着“工具理性”倾斜，忽视了“价值理性”，即忽视了“真善美”这些基本价值。学校教育也以培养“生存技能”（属工具理性范畴）为第一目的，未能以提高“生命质量”为第一目的。中国也正在向西方看齐。

在这种历史场合中，孔子的教育思想（把“学为人”作为第一目的）和伦理思想倒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，但不能照搬，特别不能让变形的孔夫子卷土重来。确实如您所讲，要完成转化性创造，要吸收西方理性文化的巨大成果，建设具有中国色彩的科学民主系统，如您所说的要走自己的路。

李：走自己的路，我一直强调这一点，在城市大学的校长沙龙里，我讲的内容就是中国要走自己的路。其实 80 年代我就讲过，各个国家的传统、资源、内外部条件、文化心理差别很大，怎么可能走一样的路？

四 告别“新启蒙”

刘：1988 年王元化先生和刘晓波又提“新启蒙”的口号，第一次在北京聚会，邀我参加，我谢绝了。这原因是尽管我充分肯定“五四”启蒙运动的功勋，但觉得时代不同了。现在科学与民主天天都在喊，问题在于如何把科学民主理念落实到制度上去。例如民主形式如何确立就是个大问题，不用说国家，就是一个学术会议，民主形式（制度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李：时代不同，课题也不同。当时我是不欣赏、不参与他们的“新启蒙”的。因为我认为 80 年代后期直到今天，主要的问题已不是启蒙，而是如何改良和改革制度。建立新的制度，比空喊启蒙更迫切、更重要，也更艰难，更需要研究讨论。即使从思想文化层面说，也不能停留在启蒙水平。80 年代我用“提倡启蒙、超越启蒙”八个字来概

括鲁迅，现在看来，似乎仍然没错，只是我说得比较简单粗略。鲁迅比其他启蒙者更深刻的地方是超越了启蒙，思考人的存在意义。不只是着眼于唤醒民众，而是展示个人孤独存在的内心。你是搞文学的，对这一点的了解和体会一定更深切。

刘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抒写孤独的内心，叩问存在的意义，在现代社会潮流面前充满不安感和动荡感，鲁迅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子。他的《野草》，其深刻性就在这里。中国现代散文能抵达这样的精神深渊，真是奇迹。鲁迅完成了超越之后，晚年受国际左翼思潮的影响，又热烈拥抱社会是非，返回救亡。一是超越启蒙；二是返回救亡，这是鲁迅精神之旅的两大现象。真正的思想者个体是很丰富的，其生命的曲线与多彩也很正常。但我们现在既不能返回启蒙，也无需返回救亡。您的“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”已属于过去。不过，回顾九十年，觉得还是鲁迅最深邃，最伟大。前些时，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姜异新博士访问我，提出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其中有一个对“五四”新文学诸主将的评价问题，我也说，鲁迅确实无人可比。胡适开风气之先，功劳很大，但思想不如鲁迅深刻，新文体的创造也不如鲁迅杰出。不过他是个学问家，不能要求他像鲁迅那样进入深邃的内心。周作人极为勤奋，“五四”时是人文主义旗帜的旗手，但其创作，有知识性却无思想深度与思想力度，比鲁迅差远了。后来他在北方“谈龙说虎”，也完全没有现代感。

五 五四新文化诸子评说

李：鲁迅一直是我最崇敬的人物。我是顽固的挺鲁派，从初中到今日，始终如此。我最近特别高兴读到一些极不相同的人如吴冠中、周汝昌、徐梵澄、顾随等都从不同方面认同鲁迅而不认同周作人、胡适。这些人都是认真的知识分子、艺术家和学问家，并非左翼作家和激进派，却都崇尚鲁迅，鲁迅不仅思想好，人品好，文章也最好。一些人极力拔高周作人、张爱玲等人，用以压倒或贬低鲁迅，用文学技巧来压倒思想内容。学界也流行以“知识”、“学问”来压倒和贬低思想。其实，严复当年就说过，中国学人崇博雅，“夸多识”；而西方学人重见解，“尚新知”。爱因斯坦的新知、见解，难道不胜过一座图书馆吗？

刘：严复的话真是击中要害。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，就说现在学界是学术的姿态压倒学术的真诚，即压倒追求真理的热情，也用知识掩盖思想的贫血症。许多人读了《告别革命》，发现您对周作人、郭沫若、老舍的尖锐批评，感到很震惊。周作人身上太多中国旧文人的习气，最后越过中国族群的道德底线，当了汉奸，真是个大悲剧。您对胡适评价也一直不高。

李：胡适和周作人不同。胡的作风很好，有成就而仍然宽容、谦和，其自由主义思想、风格，在中国至今仍有重要价值。但他的思想确实不如鲁迅深刻，例如他说中国的问题是“五鬼闹中华”，未免太浅

了。周作人散文中是有些小知识，但不是大知识。钱锺书才可以算大知识、大学问。他的学问甚至可以说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”。但也无须来者了。可惜，他在可开掘思想的关键之处，却未能深“锥”下去。这可举的例子很多，就拿《管锥编增订》（1982年9月第一版）的第一篇来说，你读读这下半段：

《诗·文王》以“无声无臭”形容“上天之载”之旨，亦《老子》反复所言“玄德”（第一〇、五一、六五章；参观一五章：“古之善为道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识”），王弼注谓“不知其主，出乎幽冥”者也（参观第一八章注：“行术用明……趣睹形见，物知避之”；三六章注：“器不可睹，而物各得其所，则国之利器也”；四九章注：“害之大也，莫大于用其明矣……无所察焉，百姓何避？”）。尊严上帝，屏息潜踪，静如鼠子，动若偷儿，用意盖同申、韩、鬼谷辈侈陈“圣人之道阴，在隐与匿”、“圣人贵夜行”耳（参观256—258页）。《韩非子·八经》曰：“故明主之行制也天，其用人也鬼，”旧注谓如天之“不可测”，如鬼之“阴密”。《老子》第四一章称“道”曰：“建德若偷”（参观严遵《道德指归论·上士闻道篇》：“建德若偷，无所不成”，王弼注：“偷，匹也”，义不可通，校改纷如，都未灰心，窃以为“匹”乃“匿”之讹。）“偷”如《庄子·渔父》“偷拔其所欲谓之险”之“偷”，宜颖注：“潜引人心中之欲。”《出曜经》卷一五

《利养品》下称“息心”得“智慧解脱”曰：“如鼠藏穴，潜隐习教。”夫证道得解，而曰“若偷”“如鼠”，殆类“孤寡不谷，而王公以为称”（第四二章，又三九章）欤。

多精彩。这段话把中国的“圣王”秘诀，他们最重要的手段和技巧是什么，全揭开了，讲到了关键。如果继续开掘下去，以钱锺书的学识本领，极易将帝王术各个方面的统治方略全盘托出而发人深省，可惜却戛然而止，转述其他。

刘：真是如此。这一则，上半段谈上帝我们把它省略了。仅此下半段读起来就够让人惊心动魄的。中国的圣人之道在“隐与匿”，帝王之术，如鼠藏穴，如鬼潜踪，但都打着深不可测的天意。中国的智慧在天子与圣人处如此变质，真是匪夷所思。钱先生的著作是个大矿藏，他用全部生命建构矿山，把开掘的使命留给后人。在可开掘思想的关键之处深锥下去，这倒是您这个思想家的特长。2002年我读您的《历史本体论》，一打开书页，第一节就讲“度”的本体性。什么是“度”？“度”就是“掌握分寸，恰到好处”。您说“度”的本体（由人类感性实践活动所产生）之所以大于理性，正在于它有某种不可规定性、不可预计性。而历史本体就建立在这个动态的永不停顿地前往着的“度”的实现中，它是“以美启真”的“神秘”的人类学的生命力量，也是“天人合一”新解释的奥秘所在。您在其他文章也多次讲“度”，把“度”与中国的中道哲学、和谐哲学联系起来思索。每次想起您这个“度”字，就想钱先生的“几”字。他在《管锥编》第一册